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25.01.011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发展历程 与未来展望

唐尧¹,李学²,葛丽萍¹

(湖南科技大学 1.期刊社;2.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事关学生知识结构打造与“三观”建设,事关国家意志的贯彻与落实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为学校课程的物质载体,教科书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建立政治文化秩序、树立共同价值观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教科书编写工作从继承解放区传统起步,经历了从全面学习苏联到逐渐中国化、本土化的转变,在教科书编写框架、编写流程、编写人才培养等方面向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不断努力。未来中小学教科书编写要在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框架下,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理念,在突出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回归育人导向,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突出学习需要,在体现时代要求的同时展现民族特色,高度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更好发挥其在教育改革中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教科书编写;中小学;现代化;本土化;教材强国

中图分类号:G624;G6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5)01-0072-0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教科书编写发展的新阶段。对新生政权而言,教科书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建和品格的培育,还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受教育人口的大量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都会体现在教科书编写之中,教科书编写的多样化发展既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恰当回应,也是应对未来竞争的必然举措。

1 新中国教科书编写的主要历程

教育变革可以划分为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1966年至1976年和1977年至今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被各科教科书那或素淡或浓烈的书影所映照^[1]。新中国教科书编写既传承了抗日根据地的传统,又借鉴了苏联的结构体系,但是,随着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内政治的变化,教科书

编写逐渐中国化、本土化,走上自主探索的道路。

1.1 以解放区教科书为蓝本的修订工作

在人力、物力、财力均极为薄弱的情况下,新中国初期的教科书基本以解放区课本为底本,稍作修订即出版使用。1949年12月23日至30日,新成立的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全国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老区教育,现在以巩固与提高为主,解决师资、教材问题”,“加强教科书编审工作的具体计划”^[2]。教科书编写成为新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各学科开始探索教科书编写的新内容与新方法。

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在编写语文教科书时,为体现与旧政权的区别,将“国语”和“国文”合称为“语文”。叶圣陶先生的解释是:口头为语,书

收稿日期:2024-10-17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XJK23AJD006)

作者简介:唐尧(1986—),女,湖南长沙人,出版中级,硕士,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编辑学研究。

面为文,故合称为“语文”。学科名称变化的同时,教科书内容、体例编写也发生了实质性变革,如要求课文选文注重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统一,删除所有宣传旧思想、旧政权的文章,代之以歌颂和宣传新思想、新政权的作品。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草案)》详细规定了教材编写的要点,如:语文应是语体文;语文教材以阅读为中心;一、二、三年级语文要兼具常识课的功能,要与其他科目相照应;等等。同时,规定了语文课本编写的整体注意事项及写话教材、写字教材的注意事项。

1.2 教科书编写全面学习苏联时期

与苏联关系密切时期,教育领域也在向苏联全面学习^[3]。1950年,凯洛夫的《教育学》在中国翻译出版,其强调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课堂教学的五环节结构,突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成为中国后面几十年教育的基本依据。改课程标准为教学大纲、语文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科、直接使用苏联编译而来的教科书等具体做法,深刻影响了教科书的编写思想和编写方式。这一时期的教科书编写表现出以下方面的特点。

一是大量选用苏联的作品,主要包括苏联文学作品和歌颂苏联领袖的文章。当时的语文教科书选用了《列宁和炉匠》《列宁在学校里》《见列宁去》《列宁的半身铜像》《论列宁》以及大量苏联现实主义和革命文学作品,歌颂苏联的伟大成就和苏联革命领袖的伟大形象。

二是直接采用苏联教科书。这类教科书集中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科目,以东北人民政府编译的教科书为例,其出版声明写道:“这一套中学自然科学教科书,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人体解剖生理学等,是根据苏联十年制中学的教科书翻译的。为了适合我国的情况,在校阅时作了必要的修改,所以说是编译。”在后来的教科书自编过程中,苏联教科书的分科方式,如数学分为算术(小学)、代数与平面几何(中学),语文分为语言与文学,生物分为动物、植物与人体解剖生理学,以及教科书强调意识形态要求、以系统的知识组织教材内容、突出智能训练等做法,都被广泛采用,对20世纪后期中国的教科书编写影响深远。

三是用苏联教育学理论指导教科书编写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教育制度到教育思想全方位学习苏联,形成以知识能力为核心

的小学、初中、高中螺旋式上升编写模式。例如,物理的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等核心知识,各个学段都有涉及,但学段越高,学习的知识越深入、越全面。教材突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吸纳生产生活中的常用知识,并要求教学与学生经验相结合。

此外,这一时期还建立了教科书统一编写、统一发行等方面的制度,教科书排版改竖排为横排,使用简化汉字。

1.3 教科书编写极度失序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在学习苏联、借鉴传统教科书编写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全国教育从“全面学习苏联”逐步转为学习苏联与总结自身经验相结合,各学科教科书根据教学目的探索合适的编排体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1966—1976年间,先前建立的教科书体系完全被破坏,教科书编写者因各种原因受到打击,编写活动也进入极度失序状态。

教科书编写失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政治挂帅成为指导思想,几乎所有教学内容都与政治话语挂钩,即便是物理课程也不例外。二是教科书内容被极度简化,学习时间被政治宣传、生产劳动等占用,学习年限被缩短(如中学改为4年),课时大量减少。三是偏重教科书内容与现实生产需求的直接对应,以及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教科书的无序状态直接影响一代人的成长,这深刻说明,教科书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基石,必须遵照人才成长的规律来编写。

1.4 教科书编写的恢复与繁荣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逐渐进入恢复期。在此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第五套全国通用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对恢复教学秩序、促进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间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其在内容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在统一教材的基础上,教育部开始探索教科书多样化发展的举措,如尝试编写适用不同区域和学制的教科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国家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对国定教科书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教科书审定制,教科书编写工作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中小学教科书步入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的轨道。

2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的主要经验与成效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不断推进的过程。教科书审定制的推行,推动了教科书编写工作在合理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促使作者们更新了编写理念,有力提高了编写质量。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在借鉴国外教科书编写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1 教科书编写框架的多样化

1978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据此编写的第五套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推动课程教学走向正常化。教科书“一纲多本”的编用体制开始形成,以教学大纲为依据,探索出不同风格的教科书内容选择、组织和训练体系。在保障知识系统、导读系统、练习系统等教科书基本要素完备的情况下,及时吸纳最新学科知识,设计符合学生学习特点的具体活动。特别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主张以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目标作为各科课程目标的基本维度,重视学习的过程体验与方法掌握,重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养成。各科教科书都在尽量体现学科特点的同时,围绕学生学习需要展开,获得了大量由教材向学材转换的有益经验。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通知,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设立的相关委员会,意味着三科教材“一纲多本”时代的结束。当年,教育部启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历史教材统编工作。

2.2 不断完善与优化教科书编写流程

教科书编写要遵循制度的规定,也要合乎实践经验范式的规范。不同出版社、不同科目在编写流程上稍有区别,整体上来说都有严格的流程。“中小学教科书强调政策导向性、经典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其编写和审查有着固定而严格的程序,对参与工作的人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4]语文教科书编写的流程是:先大纲、课标,后教科书;先方案,后选文;先选文,后练习;先主件,后附件。其他科目的教科书在内容上与语文学科有所差

别,但其编写时依据课程文件要求确定编写整体理念,依据编写理念选择知识内容和安排具体活动的编写思路是相通的。此外,教科书编写和使用过程中,都会设计广泛吸取中小学一线教师意见的环节,为教科书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学要求提供保障。

2.3 较好地处理了教科书编写工作中的各种关系

教科书编写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介绍或资料汇集,它既涉及人类文化成果的传递,又包括对既有文化的创新传承,需处理好基础性与发展性、思想政治性与学科专业性、学科逻辑性与习得差异性等多重关系。经过改革开放后40余年的探索,教科书编写的科学化、专业化程度大大提升,教科书与政治、社会、经验、师生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教科书编写越来越关注教材的可教可学,越来越凸显教材内容的文化意识,越来越注意教材的深广维度,越来越强调教材的编研合一,越来越重视教材的中国特色,越来越取向教材的深度综合,越来越需要教材的形态平衡,越来越发挥教材的国家作用^[5]。教科书以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为目标,以学生活动的有效性和学习效果的最大化为取向,将国家意识形态要求和文化遗产融入学科内容,及时总结经验,推动教科书编写质量稳步提升。

2.4 培养了一大批高素养的教科书编写人才

作为新中国教科书编写、出版的主阵地,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长期的教科书编写实践中培养了一大批高素养的教科书编写人才。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中小学教材教学》《中小学数字化教学》等刊物,成为国内教科书研究成果发表的主阵地,为教科书编写人员提供了重要的专业平台。1983年,经教育部批准,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对推动教科书编写实务与研究相结合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等国内重要出版单位也积极支持教科书编写工作,为教科书编写人员的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批国内学科研究顶尖学者担任主编,保障了教科书的学术水准。一批国内中小学一线优秀教师参与教科书编写,保障了教科书与教学实践需要的深度融合。由此,整体上形成了高级专家、专业编辑和一线优秀教师三类编写人才结合、专业和业余互补、教育与学科融

合的教科书编写队伍。

3 教科书的未来展望

教科书的高质量发展是教育高质量发展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可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体现了社会主义教科书的“强精神塑造性”,充分发挥了其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6]。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科书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未来教科书编写的发展方向。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有研究指出,迈向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关键是教材建设,教材建设的核心在于教材质量,而教材质量是否全面提升的衡量标尺是思想性是否充分彰显、科学性是否显著增强、民族性是否普遍鲜明、时代性是否深刻体现和系统性是否全面协调,这既是迈向教材强国的实践逻辑,也是教科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标志^[7]。教科书所属科目不同,涉及的内容也不同。国内教科书与国外同类教科书比较,侧重点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教科书编写在思想、技术、流程等方面都有很多共同点^[8]。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还意味着教科书编写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幅增强,由借鉴学习先进经验走向传输经验,进而国际教科书舞台占据领先地位。

3.1 教科书编写应在突出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回归育人导向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者是从知识能力素养方面提出的要求,接班人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素质,两者不可偏废^[9]。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有相通相融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方式方法。教科书编写选择的内容既不能一味与西方接轨,又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体方向自话自说。教科书编写既要突出基础性,又要培养学生的个性,给学生作出正确导引的同时为其预留发展空间^[10]。要协调处理好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可能之间的关系,既要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声音、传递中国思想,又要考虑中西文化与文明交流的共同话题和方式方法,切实形成与外国教科书强国对话的基础。

3.2 教科书编写应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基础上突出学习需要

科学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本

身无价值取向,但科学应用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教科书编写要选择未来科学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奠基性质的内容,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是教科书体现科学规律的基本指针,“科学教育的目的,不是教条式地假定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而是建立和维护科学的认识论权威,并且利用这种权威传递信息,促进态度和改变行为”^[11]。学生对科学的认知及其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一定是建立在自身理解图式基础之上的,并需要真实的而非理想化的科学实践。教科书要引导学生在科学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关注实践,并尽可能多地参与实践,在创新性人才培养上开辟出中国道路,从而体现出教科书的独特价值。

3.3 教科书编写应在体现时代要求的同时展示民族特色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经济、科技、贸易的交流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升,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及应对自然灾害和重大危机等方面都突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2]。教科书编写应根据时代面临的共同问题,融入生态环境教育、科学伦理教育、卫生防疫教育等内容,为不同类型国家应对相关问题提供示范;同时,也要根据中华民族自身文化和认知特点,在传承民族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不断创新。

3.4 教科书编写应高度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大数据运用方兴未艾,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如火如荼,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逐步进入日常生活,以及量子理论等科学研究的不断突破,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也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教育的方式^[13]。特别是在线教育的日益广泛应用,为教育教学积累了海量经验,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为改变和优化传统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当在线教育模式更多融入线下课程、课堂与教学时,新的混合教育需要超越技术的视角,重构制度中的规训与监控机制,以更专业的课程与教学设计给学生和学习赋权,未来中小学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教学新常态需要关注数字资源、流程再造和组织管理三个核心要素。同时,学校与校外机构都将走向线上与线下融合,两者在建设 and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14]。

作为课程资源的核心要素,教科书如何为新的教学设计提供更好的思路,如何在数字资源开发中取得突破性成绩,如何为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提供更好的平台,这都是值得探索的重要领域,是教科书回应技术进步、利用先进技术更好发挥其在教育改革中关键作用的基本需要,也是实现中小学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 [1] 石鸥.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语文[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序1.
- [2] 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301-302.
-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1.
- [4] 刘真福.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流程——以语文教科书为例[J].出版科学,2007(2):24-26.
- [5] 刘启迪.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材编写的反思与展望[J].当代教育科学,2018(8):15-20.
- [6] 靳晓燕.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N].光明日报,2024-03-26(13).
- [7] 余宏亮.建设教材强国:时代使命、主要标志与基本路径[J].课程·教材·教法,2020(3):95-103.
- [8] 刘复兴,曹宇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22(Z3):24-26.
- [9] 谭方正.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根本遵循、核心向度与实践理路[J].中国编辑,2023(6):4-10.
- [10] 向佐军.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路径[J].福建教育,2024(20):1.
- [11] 朱晶.科学教育中的知识、方法与信念——基于科学哲学的考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7):106-116.
- [12] 宋佳欣,董筱婷.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打牢基础——访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立新[J].人民教育,2024(5):26-29.
- [13] 夏歆怡.教科书的内涵解析与未来发展[J].教育科学论坛,2023(32):3-7.
- [14] 崔允灏,余文森,郭元祥,等.在线教学的探索与反思(笔谈)[J].教育科学,2020(3):1-24.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extbook Editing in Chines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ANG Yao¹, LI Xue², GE Liping¹

(1. Periodical Press; 2.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editing of textbook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haping of students'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worldviews,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te's will 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nation. A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school curricula, textbook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disseminating mainstream ideology, establishing political cultural order, and fostering common values. The editing of textbook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rted from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liberated areas and went through a transition from fully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to gradually Chines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t has been striving towards China-style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framework, editing proces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ditorial personnel. In the future, the editing of textbook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textbook powerhouse, prioritize the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while returning to the orientation of cultivating people, respect the laws of education while highlighting the needs of learning, reflec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while showcasing national features,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o as to play a more critical role in educational reform.

Key words: textbook edit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modernization; localization; textbook powerhouse

(责任校对 张伟平)